

泰州儒学的成物之智及其至善之止

张树俊

(中共泰州市委党校,江苏 泰州 225300)

摘要:泰州儒学在为人处世方面强调“成物”之智,要求每个人都具有谦逊的美德,主张以谦顺为本,以敬悦人,以恭敬为先。同时,泰州儒学还承继了传统的“止至善”思想,要求人们懂得止节之道,知本、知止,以止安人,始终使自己的情绪及动作施为保持在适宜状态。泰州儒学还主张以中正和人。要求在处世过程中做到至公至正,无所偏系,使人和悦。

关键词:泰州儒学;成物之智;至善之止

中图分类号:B222

文献标识码:A

文章编号:1006-432X(2014)01-0019-04

泰州儒学是对泰州历史上儒家学者思想的总体称谓。泰州儒学的智处思想比较丰富,也有独特的见解。如在处世方面,他们承继了传统的止至善思想,要求人们保持谦逊的美德做到以敬悦人。他们倡导“成物”之智,主张自我约束,使自己的言行保持在适宜状态,避免对他人的伤害。此外,他们还主张以中正和人,以中正公平的言行吸引他人、影响他人。下文试以泰州宋代理学先驱胡瑗、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、太谷学派集大成者黄葆年的思想为样本,对泰州儒学的成物之智及其至善之止的处世思想作一初步分析,求教于方家同仁。

一、泰州儒学的以敬悦人

泰州儒学继承了传统儒学仁爱和谦逊的美德,在处世方面要求以敬悦人。如胡瑗认为,不管是为官者还是一般百姓,都应该具有谦逊美德。当然,关于谦逊的表述,胡瑗有时说成谦顺,有时说成柔顺,但意思大致相同,讲的都是为人要虚谦。他认为,虚谦的意义极大,如果天子诸侯及为人父为人兄者,能够做到虚谦,那么他的品德就更加尊贵和光大,其人际吸引也就增强了。比如人虽然有爵禄之分,但如果在上者没有虚谦之德,恃其骄盈,必至于倾失,所以在上者对在下者一定要有虚谦的态度。有了虚谦的态度,天下的贤士就会相率而来辅佐自己。有了虚谦的态度,天下之人自然也会感悦于你,“近则民敬之,远则民敬之”^{[1]卷上}。所以他要求君子在礼节方面,一定要以虚谦为本,以敬悦人;尊宠臣下,礼行下士。这样大臣们就会尽心辅佐你,使你的行为不偏离正确的轨道。从为臣者来说,当然也要有虚谦的美德。他认为,为臣者谦以治民。他说:“凡在人下者,若能益尚谦退,则虽在卑下亦众人所不能言行。”为人子,为人臣,为人

妇,也会“倡而后和,行而后随”^{[2]卷1}。”不会错乱其道,无逾越也。也就是说,做臣下的如果能施谦退之礼,天下人就会学习,从而规范自己的行为,所以下者应该既以虚谦对于上,也以虚谦对于下。那么怎样虚谦对于上呢?比如,做什么事情,自己不要先作主,一定要有为君者之命,然后根据君的指示很好地执行。再如,有了好的成绩,做臣子的不能居功,应该将功劳归之于君。这样也就尽了为臣应尽的义务了。如果为臣者擅自作主,做儿子的不听父亲吩咐就去行动,做妇人的走在丈夫的前面,这就不合常理,乱了为臣、为子、为妇之道了。胡瑗非常赞赏周公忠节虚谦的品格。他说,周公尽人臣之忠节,竭人臣之思虑。使郡能制礼作乐,诸侯欢聚,天下的臣民陶然而归顺于朝廷。周公是真正做到了“上尽忠节以奉于君,下尽谦恭以下于人”,自古到今还没有周公这样美德的人。^{[3]250}此外,能否做到以敬悦人,特别是为上者能否虚谦待人,关键要有平等心理。胡瑗讲“礼”,但他并不否定男女平等、贵贱平等,有时候他甚至认为,为了成夫中之道可以男下于女,君下于臣。因为“男下于女,能成夫妇之道。夫夫妇之道既成,则能成家。君下于臣,故能成君臣之道,君臣之道既成,则能成国,国家既成,不可不久”。^{[2]卷6}所以在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上,他主张上以柔顺而接于下,下以刚明而奉于上;劝人不能骄傲,待人要有和气之辞、安人之色。

王艮在处世问题上主张自谦容人。他说:自谦“只是毋自欺,实实在自己身上用功”^{[4]37}。王艮对善于自谦的人是非常赞赏的。比如徐樾在嘉靖七年和十年,两度从学于王艮,王艮都没有授他“大成学”,直到嘉靖十八年,王艮经过十一年的考察,才写信给徐樾,称赞他恭谦好学,表示要授他以“大成学”。当然,要做到虚谦并不容易。他说:“谦者无不谦,谦者未必能谦也。”^{[4]37}“谦”是满足、满意的意思,“谦”是虚心

收稿日期:2013-12-05

作者简介:张树俊(1957-),男,江苏省姜堰人,历史学研究员,政治学教授,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哲学和历史文化。

的意思。王艮的意思是说,虚心的人能得到满足,但满足的人未必能够做到谦虚。所以,取得成功或获得满足的人,最要学会自谦。王艮还认为,能否做到自谦,关键还在于是否有爱人敬人之心。他认为,自谦的人往往是只知爱人敬人。所以真正的自谦,是“爱人直到人亦爱,敬人直到人亦敬,信人直到人亦信,方是学无止境”^[4101]。同时,王艮认为,只有爱人,才能容人。如有人问他:“能容下之慢而不能受上之凌,其病安在?”王艮回答说:“总只是一个傲。容下之慢视以为不足与校云耳。君子只知爱人敬人。”^[4119]事实上,王艮的容人也是他平等思想的一种体现,比如田夫、野叟、儿童、走卒皆钦敬,这种平等敬人,才是一种真正的容人。当然,要做到这一点,关键在于自己的素质,所以王艮说“修己以敬”,“安人安百姓,亦惟敬此而已矣”。^[4149]当然,王艮的容人也是有原则的,比如,对于他人的“所为未是,不可姑息”;“所命未善,反复思绎”。^[4154]也就是说,容人并不是不分是非。不过对于他人之过,不可姑息也要讲策略。事实上,王艮是讲“智处”的。“智处”讲的是人与人、人与社会相处的艺术。比如,王艮说:“不面斥朋友之失,而以它事动其机,亦是‘成物’之智处。”^[4101]王艮的这一观点是就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关系而言的,在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也要有这种“成物”之智。客观地说,泰州学派的豪侠气概和战斗精神是很突出的。尤其是王艮对传统理论的批判非常强烈,但他的这种批判并没有受到官府或其他学者的攻击,因为王艮的“斗争”也是讲策略的,其把握的基准是:“见险而能知止。”^[4138]一方面,王艮对封建制度的批判大多是以“建议”形式出现的。这种“建议”方法就不可能引起统治者的反感;另一方面,王艮的许多命题,都是借用儒家经典中的范畴,袭用了王学的某些语言、概念和范畴,传述了孔子、王阳明等人的一些话来表达其“异端”思想的。所以王艮的批判也好,理论创新也好,直接攻击的痕迹并不明显,这也就是王艮所解释的“止于至善”。

太谷学派在敬人问题上讲得也比较多。如黄葆年从治国平天下的角度论述了敬人的意义。他说:“天下非一人所能治也,则选贤与能而已矣。”而要选贤择能,共济天下,就要通过敬人以吸引天下人才。同时他把平等待人看作敬人的心理学基础,他认为,“君与臣同也,臣与君同也,君臣与民同也,大不欺小,则无所谓小大也,小大同也;强不侵弱,则无所谓强弱也,强弱同也;众不暴寡,则无所谓众寡也,众寡同也;中不虞外,外不诈中,则无所谓中外也,中外同也。”黄葆年甚至认为,“天下古今人心”也是相同的,这就是大同!^[51584-588]在敬人问题上,黄葆年还强调修身敬人、修己容人。他说:“君子以去恶者修己,以隐恶者容人。能容能隐,我之愚化,人亦久面自化焉。”^[6207]他要求人们特别是士人耻其所耻,耻其身之不修,而鄙薄耻非所耻,如耻恶衣恶食之类。黄葆年主张自修,反对说人,如黄葆年对《礼记·曲礼》中的“礼,不妄说人,不辞费”解释说:“礼以正立,说人则妄矣;礼以简明,辞费则烦矣。”^[5142]怎么样做到不说人以自修?黄葆年要求从日常生活做起。他说:“人之失足也,多在行止坐卧之间,则人之自修也必在行止坐卧之间矣。”^[5136]又说:“用饮食而九疇彝之绎叙存乎其间。一事紊其序而必有所不安一物失其所,而必有所不安也。”他还举例说:“昔者,从学龙川夫子二十年,见夫子每逢进食,必亲为易置,俾各得其所安,有如此礼经矣。”^[5142]黄葆年这是从修礼的角度说的,其实修

敬人之心也要从日常生活中的举手投足、行止坐卧做起。因为礼为仁的表现,“爱人者,由仁行也。以敬存心,礼理心也。敬人者,由礼行也。”^[6397]比如,“取爱母之心以事父,而敬生爱也。取敬父之心以事母,而爱生敬也。”^[6428]在容人方面,黄葆年强调得更多,当然也有点过分,比如说:“愿莫大乎攻人之恶,隐恶而扬善,日月光华之象也。一家相攻而家败矣,一国相攻而国亡矣,天下相攻而天下大乱矣。”^[6205]黄葆年这种不责善、不攻恶的思想与王艮的思想相比,则缺少了处世的原则性了。

二、泰州儒学的以止安人

泰州儒学在处世方面十分重视“止于至善”的作用。这里的“善”不是一个道德概念,而是适中、适宜的意思,或者说是一种最佳状态。处世中的“止于至善”,实际上是要人在情感、言行等方面,注意进行调节,做到顺而动之,以保持与他人、与社会的和谐状态。当然,由于不同学者对于“止至善”的认识不同,所以其表述及其强调的重点也不同。比如胡瑗说:“明健顺动入止”就是一种动静适宜的要求。^[21发题]他认为,“专务良止而不求进,则失其动静之中道,非仁义之人所存心也”^[21卷9]。但物不可以终动,物也不可以终离,“必须有止节之道也”。^[21序卦]他甚至主张当险难在前的时候,也要做到“见险而止,待时而动,不务速进”。^[21卷2]他认为,“尚智在于知机识时,可动则动,可进则进,可静则静,可退则退,动静进退皆不失正。”^[21恒上六]“若行而不失其动之时、止而不失其静之时,行止动静,皆得其时,则其道光大而明。”^[21卷9]当然,“止”也有一个过程,所以,“止物必有所渐”,“渐必有所归”。^[21序卦]对人的欲望控制也是这样,他说:“凡非至圣之人,不能无邪曲之情”,但邪曲之情不能过度,必须“规戒制畜之,使其思虑不入于邪言,动皆由于正”。^[21卷3]为此,要通过教育引导,使人懂得“止于至善”的道理。他说:“人之生愚夫愚妇者甚众,其性昏蒙,憧憧然不知所以然而然,举动之间,虽有凶咎悔吝之事,而不知自止,是故圣人以此大易之故,明其吉凶忧患,使趣其善者,舍其恶,向其吉者,背其凶,是大易之道与民同忧患也。”^[21系辞上]

泰州学派的王艮是重视“安身”的,并把安身与安国、安天下联系起来,从“格物”与“知本”、“立本”与“安身”的关系,发展到“安身”与“安家”、“安国”、“安天下”的关系。他说:“身安而天下国家可保。”^[4102]“安身者,立天下之大本也。”^[4101]所以安身比修心更重要。他指出,“不知安身,便去干天下国家事,是之谓失本也。”^[4102]就是学习,也要先安身。他说:“人有困于贫而冻馁其身者,则亦失其本而非学也。”^[4113]当然,王艮有时候把“安身”与“保身”混同起来,说成是一件事情。王艮这样混同,不是因为王艮糊涂,而是因为王艮看来,不能“安身”就难以“保身”;不能“保身”也就不能“安身”。王艮所讲的“安身”,并不只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生活安定,也不同于他所讲的保身。王艮安身的重点是“安心”,所以他有时也讲“静”,希望人们能够通过“静观”自我,进而做到“不怨天尤人”,安心修养。有人对王艮的这一说法表示怀疑,对他说:“伯夷、叔齐虽然没有安其身,但他们很安心。”王艮解释道:“安其身而安其心者,上也;不安其身而安其心者,次之;不安其身又不安其心者,斯其为下矣。”^[4117]要安身除了安心之外,还要做到安身而动。他认为,安身而动,便智

巧。而安身而动的关键又在于行动上能够“止于至善”，做到动静适宜。他说：“动静不失时宜，其道光明。”^[438] 所以他与胡瑗一样，提倡“当行而行，当止而止。”^[449] 当然，王艮的“止”与胡瑗的“止”又有所不同。王艮的“止”是止仁、止敬、止慈、止孝、止信。知止，即知其所止，也就是保持人的心理与行为的最适宜状态。知止就能知安身，知安身也就能止至善。不过，王艮也知道，一个人要处处做到“止于至善”并不容易。他说：“欲止至善，非明格物之学，不盖物有本末，遗本失我，遗末失人，欲止至善难矣。”^[474] 王艮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如果不真正把握好格物学的真谛，就不能处理好“本”与“末”的关系。要么忘记身这个“本”而不能安身，要么忘记国家的利益而丢掉做人的标准。所以，“止于至善”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并不容易。

在人与他人、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，太谷学派把“教”与“养”结合起来，目的也是为了把自己的讲学传道的活动保持在“至善”状态。比如太谷学派讲究“理财”，其目的就是引导群众，通过自己的生产活动致富，而非依靠他人来养活自己，这样使自己与社会保持一种平衡，促进社会安定。太谷学派还主张相互支持：“货恶其弃于地也，不必归己；力恶其不出于身也，不必为己。”^[7]意思是说，人们珍惜劳动产品，但毫无自私自利之心，不会将它据为己有；人们在共同劳动中以不出力或少出力为耻，都能尽全力地工作，却没有“多得”的念头。太谷学派非常重视《周易·系辞》中的一句话：“天地之大德曰生，圣人之大宝曰位。何以守位？曰仁。何以聚人？曰财。理财正辞，禁民为非曰义。”认为有权力的人要“以不忍人之心，行不忍人之政”；无权力的人要“以不忍人之心，行不忍人之事”。^[7]黄葆年基于这种相互帮助的思想，主张不始祸，不重怨，不思非分，不好妄言，以不与他人和社会发生矛盾。在黄葆年看来，争是祸之基。他认为，“天下之祸莫大于争，君子争理，小人争利，皆祸之基也。争起于彼我。彼我始于兄弟，极于戎狄蛮夷。异其俗则群相欺正；异其教则群相疑焉。”^[6947] 黄葆年的这种不争思想与道家的无为和儒家的天地胸怀是一致的，其本质依然是一种明哲保身的人生哲学。此外，在处世问题上，黄葆年还强调“体人情”。他说“性情者，仪节之实也。”认为在处世的过程中只重视礼仪而忽视人的性情，礼仪也就成了虚假的东西。当然，性情也要保持在“至善”状态，因为“性情过矣，乃自抑以从先王之礼”；“性情不足也，乃克自勉强以企及乎先王之礼”。^[5974] 只有既见礼又见情，才能在处世交往中的保持知本、知止的适宜行为。

三、泰州儒学的中正和人

处世智慧还在于提高自己的人际吸引力，所以泰州儒学在处世方面强调自己的形象塑造，当然，这种形象塑造表现在许多方面，泰州学者们从不同角度，对如何进行形象塑造提出了要求。虽然论述的角度不同，但都提出了以正和人的要求。

比如，胡瑗所讲的“正”与“公平”是联系在一起的。他认为，为官者要得到群众的拥护与支持，就必须做到“至正至平”。所谓“至正至平”，就是“无偏，无党，无反，无侧”^[14卷上]。尤其是为官者在具体的管理活动中要尽力做到“至正而不邪，至公而不私”^[4系辞上]。他认为，从自己对人的影响来说，感说之道，只有至公至正，无所偏系，才能“使天下之人自然而说

之”。^[24卷10]从领导的效果来看，只有至公至平，无所偏系，才能兴滞补弊，扶衰拯弱，立功业于天下。当然，要做到“至公至平”必须从多个方面去做，比如在用人方面要按才德受任。他说：“人才有大小，若才不甚大而加其烦任重职，则必有凶败之至。”^[24卷8] 胡瑗认为，人的才德与其职事要相称。“若职事过其才分，则有隳官之谤矣。”^[24卷8] 所以，“小力之才，必当任其轻小之用，若任以国家之重器，其胜任者亦鲜矣”^[24系辞下]。再如，在财物分配上应均平，要“使多者不得积其私，少者皆得尽其养”^[24系辞下]。还有如，在断讼量刑方面要刚明中正，公正无私，辨其情伪，正其枉直，使无至于失法，又不可生份其民，须做到“赏必信、罚必当，正身、立法度、平典章、宣政教以节天下之人”^[24卷10]。这样，奸伪巧诈之人就不敢生事，而民众也就自然信从你了。当然，要做到这些并不容易，关键要有“刚明”之才，因为“才识明达、智虑过晓”，才能弄清事实真相，做到“无所偏觉，临事果断”，使人信从，受人拥护。^[24卷2] 在胡瑗看来，能否做到至正公平，首先取决于统治者本身的素质，特别是统治者是否具有“至正之德”。他说：“圣人非善于一身，以至正之德，上符于天，下合于地，中合于人，无私无枉，无所不契。虽旁行于天下之间，亦无私邪淫过流荡之事。所以然者，盖至公至正而致然也。”^[13220] 如果有了至正之德，那么就很容易息于险难，如果再能够做到以信接人，那么天下的贤者就乐与跟从。同时，如果圣人有了刚明之德，那么就会事业有成，上合天心，下顺人情。反之，如果“不能自正其身，又不能节制其人，是虽有严刑峻法，人亦不从”^[24卷10]。当然，胡瑗所讲的“至正之德”不是对少数人的要求，他认为，为君为臣为百姓者都要讲“至正之德”。

王艮也讲“正”，他讲正也是为了“和”，如他在《大成学歌寄罗念庵》中这样唱道：“我说道，心中正，个个人心自中正。常将中正觉斯人，便是当时大成圣。”^[445] 显然，王艮把中、正、和三者统一起来了。他把“中”、“正”看成实现“和”的重要途径。什么是正呢？比如无私无妄便是“正”。王艮这里揭示了影响“正”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，这就是私欲问题。王艮继承了传统儒学思想。认为贪得无厌的人欲违背了天然自有之理，所以他把人欲看成了不“正”的根源。王艮还从本体之乐的角度论述了私欲的危害。他认为，人不能获得真正的快乐是因为人心被私欲所缚。“私心”使人不乐。他把乐看作是人的心之本体，要求人们消除“一萌时”的有害的私欲干扰，在学习上以“乐”为本，真正进入“乐学”的精神境界。所以，“中”也成了他的处世哲学的重要内容。当然，王艮讲正，不是要独善其身，而是要在与他人、与社会的关系中发挥作用。他的这一思想也是从他的“淮南格物”论生发出来的。他说：“物格知至，知本也。”^[445] 由于己身是天下万物之本，所以一切道德行为（信、爱、敬）都应从己做起。在王艮看来，所谓“格物”，就是认识自己为天下万物之本，从而进行修身（正心诚意），一方面保身，一方面和人。所以，从这一方面理解，其格物思想，最终目的都是为了约束自我，修正自我，使自己与他人、与国家保持和谐关系。他认为，只有个人的行为端正，然后才能影响他人、社会、国家。只要严格把住自己的方正规矩，就能提高自己的人际吸引力，也才能使自己的言行成为社会的表率。

太谷学派的黄葆年在接人处世方面，总体上是以中庸之道为指导的。他认为秦汉而后，“中庸之德民鲜久已。斯言

也,盖欲学者之反其本也。”^{[6]179} 这里,黄葆年一方面强调中德,另一方面就是强调以中和人。他认为,为人处世,应该行中规、言中矩。而中规、中矩的核心要求,就是为人以正。比如“问习坎,水洊至何谓也?”黄葆年回答说:“盈科而进也。”“流水之为物也,不盈科不行。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。”他认为,“君子所以存心也,渊渊其渊也。”“君子所以存性也。浩浩其天也。”“以天行地势之自然而言曰洊。”^{[6]293} 黄葆年从水周流而进,推衍到君子之道;由坎卦之象,讲到君子存心养性之理,其所要说明的就是顺其自然之正道。以正和人,首在正身。如何正身?他从气功之练推衍开去,主张通过养气而修身、立身,进而保持一身和气。他说:“身老矣而有不老者存焉,虚以下人之气也;身病矣而有不病者存焉,和以接物之气也;身富贵矣而有若不富贵者存焉,欲然若不足、惻然念民劳之气也。由此而养之,由此而敬修之,而气充有不充而身焉有不立者乎?”^{[8]147} 黄葆年这里所说的气即是一团和气,也是一种真气、正气。这实际上也是黄葆年以正和人的一种思想体现。黄葆年说:“和于己曰信,和于人曰善,和于家曰孝慈,和于学曰亲师曰取友,和于天地万物曰圣人。一念失和则心不正以,息失和则气不顺矣。”^{[6]415} 能和于人,能和以接物,能惻然念民之劳,能充此一团和气,那么也就有了和人之正、和人之智了。

总而言之,泰州儒学在为人处世方面强调“成物”之

智,要求每个人都具有谦逊的美德,主张以谦顺为本,以敬悦人,以恭敬为先。同时,泰州儒学还承继了传统的“止至善”思想,要求人们懂得止节之道,知本、知止,以止安人,始终使自己的情绪及动作施为保持在适宜状态。其主张以中正和人,要求在处世过程中做到至公至正,无所偏系,使人和悦等思想, also 具有重要意义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胡瑗.洪范口义[G].四库全书文渊阁本(缩印本)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6.
- [2] 胡瑗.周易口义[G].四库全书文渊阁本(缩印本)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6.
- [3] 徐建平.胡瑗[M].北京:中国文史出版社,2000.
- [4] 陈祝生.王心斋全集[G].南京:江苏教育出版社,2001.
- [5] 方宝川.太谷学派遗书:第二辑(三)[G].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,1998.
- [6] 方宝川.太谷学派遗书:第一辑(四)[G].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,1997.
- [7] 金文子.我所知道的太谷学派[J].南京理工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,2005,(5):20-25.

【责任编辑:宋祥军】